责编：泰阳　E-mail:ccps6235@126.com　Tel:010—62806235　　2014年7月28日

军事战略

中日近代海军装备建设差别何在

□刘相春

中日两国近代海军装备建设同时起步、结局迥异，个中原因，令人深思、发人深省。对其建设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可使我们从装备建设角度深刻认识清政府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海军发展战略

海军发展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植根并发端于国家、民族的海洋观念、海权意识和国防政策。

清政府海军发展战略消极被动，极大制约了海军建设全面发展。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而言，海军必然是一个战略性军种，对于国防安全、国家发展和民族权益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然而清朝封建统治者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加之自身昏聩无能、目光短浅，对海军战略地位始终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从未将海军作为遂行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拒敌于海上的有效力量，仅仅将其用于消极被动的近岸防御。李鸿章在筹办洋务之初就曾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其后又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因此，当北洋海军力量渐强之时，李鸿章一方面希望“无事时扬威海上”，以达到“建威销萌”的威慑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充分暴露了其“避战保船”的消极心态，不敢亮剑对敌的虚弱本质。在这种消极被动的海军发展战略制约下，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始终难以摆脱“舟师”“水军”的历史阴影，其全面建设更是无从谈起，也给马江之战、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注入了必然的因素。

日本将发展海军作为基本国策，海军发展战略积极主动，是其击败北洋海军、夺得东亚海权的关键原因。日本秉承“强军是富国之本”的军事发展战略，明治天皇即位伊始就昭告全国，要“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明确“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意图通过大整军备、武力征服，成为东亚的霸主乃至东方的不列颠。在这样的海军发展战略指导下，自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至甲午战争（1894年）爆发，日本先后实施了八次扩大海军案，持续、全面、系统地加强海军建设，最终通过甲午战争夺得东亚海权，继而又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开始走向谋求世界霸权的不归路。

海军装备发展战略

海军装备发展战略必须服从服务于海军发展战略，应基于海军的使命任务和潜在敌人的装备发展情况审慎提出，其目的是正确指导海军装备中长期建设，为赢得战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清政府没有明确的海军装备发展战略，装备建设盲目被动、事倍功半。在海军装备建设过程中，清政府缺乏对世界海军装备发展趋势的持续跟踪，虽曾将日本列为潜在敌对国家，但未能深入研究日本的军事战略及装备发展情况，并据此做出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每一步发展都是深受外界刺激后被迫做出的决策，都是假手洋人盲目做出的选择。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始有加强海防、整备海军之议。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方下定决心从国外购买先进舰船，结果听信英国人赫德、金登干等人的吹嘘，把“蚊炮船”视为“攻守利器”，使用后才发现其不耐风浪、航速慢、火炮精度差，用于守港差强人意，出海作战勉为其难。赫德鼓吹快碰巡洋舰“可保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清政府又购买了“超勇”等两艘舰船，希望借此克制日本铁甲舰。尽管这两艘快碰巡洋舰都参加了甲午战争，但实战证明这种风帆时代的战法，在近现代海战中缺乏用武之地。另外，清政府从1875年就着手购买铁甲舰，但由于国内政治斗争、人事更迭、经济拮据等各种原因，购舰事宜一再拖延，直到1880年底才从德国船厂订购了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

在海军装备建设过程中，清政府缺乏对世界海军装备发展趋势的持续跟踪，虽曾将日本列为潜在敌对国家，但未能深入研究日本的军事战略及装备发展情况，并据此做出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每一步发展都是深受外界刺激后被迫做出的决策，都是假手洋人盲目做出的选择。

日本海军明确以战胜北洋海军为发展目标，装备发展战略有的放矢，装备建设事半功倍。自明朝末年至近代，日本“侵华”“并华”的狼子野心史不绝书、昭然若揭。早在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时，其最终目的即在远征中国，并声言“其征大明，虽非所欲，实乃天授”。被称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在其《脱亚论》等著作中，充满仇华、辱华及侵华的言论。日本近代海军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针对北洋海军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快船快炮”克制“坚船大炮”的战术战法。特别是从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到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短短3年间添置6艘主力战舰，包括为对付“定远”“镇远”铁甲舰而专门定制的“三景舰”。这些新式舰船不仅航速快、机动性好，而且普遍装备管退式速射炮，在火炮射速和精度上均强于北洋海军的架退炮，这些技术优势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装备建设组织管理

海军装备技术复杂，经费投入大、涉及方面广、决策层次高，需要顶层筹划、长远规划、统一计划，组织管理工作至关重要。

清政府海军建设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导致装备建设一盘散沙、半途而废。自开始筹建近代海军直至甲午战败，清政府始终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海军建设专管机构。1860年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主要办理洋务事宜并监管海防建设；1875年分设南北洋大臣司理海防，将本应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的海军建设，交由地方大员自行筹办；1879年于总理衙门下设海防股管理海防事宜，但却有名无实、未见成效；1885年终于设立海军衙门，但其主要大臣均为兼职，且大多是不谙海军事务的满清权贵。这样松散无力的组织管理体制，导致海军建设管理混乱、各自为政，装备发展缺乏长远系统规划，而是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很大的临时性和随意性。至甲午海战前，北洋海军主战舰艇共计33艘、16个型号，其中仅8艘巡洋舰就分为4个型号。舰炮型号更为复杂凌乱，共装备口径从11毫米到305毫米的各型舰炮20种，仅75毫米以上的大中口径舰炮就有12种之多。

日本效法英国海军建设经验，对海军施行中央化管理，统筹谋划制度建设、人才培养、装备发展等各项工作。日本明治维新后就对海军施行中央化管理，以便将海军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从而作全方位的策划。首先于明治元年（1868年）设立军务官，管理全国的海陆军事务；次年废军务官设兵部省，分置陆海军总监管理陆海军事务，其中海军组织管理架构效法英国，总监下设秘书、军务、造械、水道、会计等局，及兵学寮、造船司、水兵部、陆战队、海军提督府等机构。1873年废除兵部省，分设陆军部与海军部，从而使日本海军彻底摆脱陆军的牵制而独立发展，其后又取消了分区舰队，统一为联合舰队。在这样的组织管理模式下，日本海军装备建设需求明确、方向坚定、措施得力、成效显著。

清政府“大治海军”的口号喊得很响，对海军的实际投入较少，海军建设困难重重。日本将“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的口号落到实处，竭尽所能加大海军经费投入，海军建设突飞猛进。

装备建设发展途径

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初创之时，国内都没有近代化的工业基础，因此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买后造、买造结合”的发展道路，但装备建设的成效却大相径庭。

清政府海军装备建设过分依赖进口，引进消化吸收不够，未能形成独立自主发展能力。清政府在“造”与“买”的问题上陷入阶段性的偏废，前期造船起点较低，不注重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战技性能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建造成本过高；后期过于依赖进口，大量依靠国外技术和人员，装备性能水平虽然大幅提高，但由于缺乏独立自主发展的意识，对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国内造船工业扶持不够，而是将其视为累赘，任其自生自灭。黄海大战后，北洋海军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各种海军装备，但国内造船业早已凋零殆尽，勉强造出的舰船也不堪一战，只能通过从英德订购的少量巡洋舰和鱼雷艇装点门面、惨淡维持。

日本在外购舰船的同时，高度重视自身造船工业的发展，为其装备自主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向法国购买“三景舰”时，就将三艘之一的“桥立”号的组装任务交给本国船厂，借此提高国内造船工业的能力水平。同时，还积极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归国后除能自行仿制外还不断加以改良创新。如派人前往德国、英国学习造炮、炼钢及鱼雷制造等先进技术，后续研制出“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等装备。这也是日本海军装备研制能力突飞猛进，最终可与英美法俄等海军强国分庭抗礼的重要原因。

装备建设经费投入

先进顶用的武器装备是赢得战争的物质基础，也是建造价格不菲、维护代价高昂的“吞金巨兽”。但为了赢得战争、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必须做到舍得投入，并且能够持续投入。

清政府“大治海军”的口号喊得很响，对海军的实际投入较少，海军建设困难重重。1885—1894年，清政府年度财政平均收入约为8360万两白银，北洋海军年度经费预算仅为200万两，约占年度财政平均收入的2.4%左右，但实际上这笔海防经费始终不能如数拨付。例如：1885年，清政府财政收入7708万两，北洋海军实得经费143万两，为应得数的71.5%，占财政收入1.9%；1889年，清政府财政收入8076万两，北洋海军实得经费96万两，为应得数的48%，占财政收入1.2%；1891—1894年，清政府财政收入合计33818万两，北洋海军实得经费合计504万两，为应得数的63%，占财政收入1.49%。据初步统计，1885—1894年的十年间，北洋海军年度实际军费平均占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1.52%左右。

日本将“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的口号落到实处，竭尽所能加大海军经费投入，海军建设突飞猛进。1885年，日本财政收入为5111万两白银，海军军费为399万两，占财政收入7%；1889年，日本财政收入为6197万两，海军军费为963万两，占财政收入的16%；1891—1894年，日本财政收入合计28327万两，海军军费合计2465万两，占财政收入的8.7%。据初步统计，1885—1894年的十年间，日本海军年度军费平均占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10.38%左右。其间，日本皇室多次从内库拨款建设海军，日本政府官员及普通国民也积极踊跃为海军建设捐款。

两组数据相互比较，情况一目了然。1885—1894年，北洋海军实得经费1252万两，日本海军实得经费6416万两，日本投入经费总量是清政府投入北洋海军的5.12倍；日本海军军费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是北洋海军所占比例的6.83倍。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上未能足额投入，结果甲午战败后，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就高达2.3亿两白银，如果这笔钱能够持续用于海防建设，甲午战争的结局会不会改写，值得深思。

（上接第1版）

贪生怕死。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在甲午战场上，舍生取义的将士不少，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许多将领带头逃跑，经常致使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甚至发展到集体投降。平壤战役，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狂奔五百里退过鸭绿江，把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其中仅粮食一项就足够进攻平壤的14000多名日军吃一个多月。拿破仑有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战斗精神对战争胜负的作用显而易见。战场呼唤军人血性的回归，如果清军多几个左宝贵、邓世昌，少几个叶志超、赵怀业，恐怕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任人唯亲、将帅无能
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

记者：军纪松弛，军风不正，凭什么打造一支钢铁部队？您刚才的介绍再一次证明一个道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当时清军中多一些英勇善战的将领，也许甲午之战的结果就会改写？

褚益民：可惜历史是没有“也许”的。甲午战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任人唯亲、将帅无能，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战场本来是造就英雄的舞台，甲午战争却成了清军庸官败将亮丑的“哈哈镜”，集中反映了清军在选将用将、练官练将上的种种弊端。

选将不公。特别是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当时李鸿章掌握军政大权，在将领的选拔上重视门生、重用淮军出身和安徽同乡。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打仗打的就是人。如果在选将上搞不正之风，搞小山头，就会严重阻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个问题也为清军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祸根。

用将不当。主要是在调兵遣将上缺少章法，没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鸭绿江防之战，李鸿章拆东墙补西墙，把经营旅顺12年、熟悉要塞攻防作战、74岁高龄的旅顺主帅宋庆和所属的毅字军急调到九连城，一方面造成旅顺地区有将无帅、防守空虚，另一方面又导致鸭绿江防两个主帅，加上宋庆仓促上任，一不熟悉部队、二不熟悉地形、三不熟悉敌情，像虎山要塞这么重要的地方才部署了600多人，加上驻在山边的也就不到2000人，使鸭绿江防仅3天就全线失守。做不到量才用将，既误人，又误战，更误国。

练将不力。毛泽东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甲午战争的清军参战将领，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但他们更多的是固守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那套做法，对近代战争谋略和技战术的学习却不屑一顾。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就以枪炮操作为例批评说，中国将领对于“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速率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等枪炮的技术性能没有多少人能说得上。在作战中日军经常采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暗度陈仓等计谋，从李鸿章到各级将领多次上当。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善用谋略本是我们的强项，却成了日军的取胜之道，确实需要引起深思。

毋忘甲午之耻，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记者：如今，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又笼罩在亚太上空。对此，您有什么想告诉您的官兵的？

褚益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会重复规律和教训。今逢甲午，狼烟犹存。我们回望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镜鉴甲午；我们反思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不让甲午的悲剧再现。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许多战场遗迹都成了休闲观光的场所。包括日俄战争修建的所谓战绩碑、表忠塔，现在也成了景点，游览的人群熙熙攘攘。有多少人在想这是国耻军耻？侵略者的战绩碑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耻辱碑。现在伤口虽然愈合，但伤痕犹在，当前最需要唤起的就是强烈的耻辱意识，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而后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我们就是要做那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如果还不警醒起来，难保那段屈辱的历史不会重演。

沈阳战区镇守东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甲午战争，清军入朝作战一溃千里，国门上几个口子都没守住，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让中华民族背上了从未有过的灾难和奇耻大辱；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气吞山河，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最终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为新中国带来了60多年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是当千古骂名的清军，还是效仿流芳百世的人民志愿军？答案毋庸置疑。能打仗打胜仗，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军队必须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

特别是作为高层党委和高级干部，有一些问题要深入思考。第一，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到底强不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有没有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使命任务，有没有看到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潜在威胁，有没有认清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第二，战备、训练、保障以及指挥能力与打仗要求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对打什么仗、同谁打仗、怎么打仗心中有没有数，像甲午之前的“和平积习”还有没有，研究的战法训法是不是管用，训风演风考风改得怎么样，一旦有事部队能不能完成好任务？第三，工作重心到底聚焦到打仗上没有？心思精力集中不集中，工作落实到位不到位，能力素质适应不适应，尤其是打仗的导向有没有鲜明确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各级党委在领导部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要通过重温甲午历史，反思甲午教训，把昨天的教训变成今天的财富，运用于工作指导，把部队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强军兴军的实践上，凝聚到能打仗打胜仗上，凝聚到履行肩负的神圣使命上，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

当代世界军事

俄军反思信息战能力不足

□朱长生　赵卫忠

今年2月底以来，俄军在克里米亚展开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色，但也暴露出信息战能力的缺陷。近日，俄著名军事专家、退役少将谢尔盖·佩丘罗夫就此发表了看法。

俄军在克里米亚军事行动
面临复杂舆论环境

俄军在克里米亚采取的军事行动，面临异常复杂的舆论环境，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围绕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合理（法）性、俄军采取的行动是侵略还是维权、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等问题，美西方、乌克兰同俄罗斯，甚至是俄罗斯、乌克兰国内，不同观点的交锋、信息对抗尖锐激烈，美西方、乌克兰临时政府同俄罗斯的国防、安全利益相互碰撞，俄军面临一项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务是，既要向参与行动部队又要向克里米亚当地居民和乌克兰驻军部队进行信息宣传，讲解俄方政策立场、合理利益诉求，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方理解、支持。面对信息战的强大需求，俄军却显得力不从心，对所展开的行动，没有作出十分明确、强有力的宣传解释。以至于当克里米亚已经加入俄罗斯，尽管对国防部《红星报》的需求成倍增长，但无论是在辛菲罗波尔，还是在刻赤，都无法看到该报。这说明，经过股份制改造的《红星报》印刷出版公司，并没有做好准备，提高部队的士气。

不当裁撤导致俄军信息战能力不足

造成俄军信息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谢尔久科夫主政下的俄军“新面貌”改革对信息宣传工作不当削弱。“新面貌”改革（2008年10月）前，俄军共有51家军事新闻媒体、20个无线电电视广播中心（台、站），编制人数1463人，其中军人464名，文职人员999名。“新面貌”改革中，俄军新闻报刊部门削减了57个文职人员岗位，75个军人职位改由文职人员担任。此外，国防部《红星报》、军区（舰队）报出版和印刷部门中军人职位（14个）全部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出版部门削减了45个军人职位和67个文职人员职位，同时，把140个军人职位改为文职人员岗位；电子类新闻媒体，削减了8个军人职位和55个文职人员职位，32个军人岗位改为文职人员岗位。经过几年改革，传统上在类似克里米亚军事行动中应充分发挥作用的军事报刊体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没有专业人才和机动印刷站，旅级报纸编辑部名存实亡。几年前，因“不需要”，军事大学停止了军事记者的培训。军区级和舰队级报纸编辑部因取消军人编制，也在承受着人才缺乏之苦。国防部印刷出版机构实施的股份制公司化改造，造成像在克里米亚事件这种特殊时期，俄军不仅无法吸引克里米亚有亲俄思想倾向的居民注意力，也无法吸引自己的黑海舰队部队官兵的关注。

俄军在克里米亚军事行动面临复杂舆论环境。面对信息战的强大需求，俄军却显得力不从心，对所展开的行动，没有作出十分明确、强有力的宣传解释，造成俄军信息战能力不足。

对俄军增强信息战能力的建议

佩丘罗夫主张，摒弃当前俄国防部仍占主流的军事报刊“过时论”、互联网与苹果手机等新媒体能够解决一切的观点，从实际出发，利用俄军历史经验，采取有效方式培养军人战斗精神品质。

重视信息—解释工作。培养军人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那种以为军人战斗精神品质会通过母乳传递、提高薪金便可提高的看法是过时的和片面的。当前信息—解释工作比苏联时期更为重要。只有军事报刊才有可能成为推广部队先进经验、向军官提供各种实际建议解决服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加强军事新闻媒体建设。扩大信息传播网络。俄美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提醒。当前，对俄国防部信息手段一体化问题的讨论较多，这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把影响军人智慧的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可更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一资源，开展对军人的信息—解释工作，培养其战斗精神品质。关键的问题是一体化应遵循的原则。建立国防部广播电视部门，并着手在基地、大型营区、独立部队设立相应部门。着眼军营合并扩充现状，加强旅级报纸的编辑工作，将其转变成货真价实的定期出版物，把服务对象定位于某一营区军人、军人家属、当地居民等具体读者。

振兴传统“品牌”、创新传播手段。振兴负有盛名的传统军事报刊，最大程度地挖掘、发挥民族“品牌”优势。当今俄罗斯新的报刊和网络资源不断涌现，并且在新闻传播方面展示出相当高的权威性，吸收这些成功独立军事报刊和网络资源参与军队信息—解释工作，从实际需要出发，鼓励更多的军官订阅，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帮助官兵解答困扰部队建设的各种问题。